

新生代农民工过渡性身份认同及其特征分析^{*}

杨宜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 我国大规模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和从事工业生产已经有了超过30年的历史,“农民工”这一身份的异质性也在增强。其中平均年龄在26岁,人数接近1亿人,频繁在各地、各行业/企业跳槽的新生代农民工,其身份认同呈现明显的过渡性。这不仅表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渴望成为城市人(趋)而不能,不愿成为农民(避)亦不能,徘徊在以城市居民身份替代农民工身份的过程之外,而且表现在城市和乡村对他们的双重身份排斥而导致的身份边缘化(半城半乡),以及既不认同农民工身份,也不认同城市居民身份的身份空白化(非城非乡)。本文梳理了认识农民工身份认同的5个理论视角,试图通过对跨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涵化理论、社会认同理论中的群际关系理论、社会心理学的动态建构理论、社会表征理论和全球化理论的梳理,为认识农民工身份困境提供理论思考资源。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来自制度性分类,而非个体在身份选择上的徘徊。他们的身份认同困境还来自制度性分类本身带有的地位高低的结构性,与他们渴望向上流动的动机之间的矛盾,从而造成他们处于两种力量的角力之中,陷入双重排斥的处境。透过新生代农民工这些身份认同困境,可以看到城乡权力关系中的问题。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过渡性身份认同;社会类别

[中图分类号] D4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2013)05-0076-10

一、新生代农民工与城镇化

自中国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已经接近60年;自1980年以来,农村劳动力跨地域流动基本规模已经达到2亿多人,其中48%的人是16—2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2012年,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史的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经济增长速度也跃居世界前列。这些数字记载着我国近30多年来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可以让我们了解本研究的背景。城镇化水平超过50%不是简单的人口百分比变化,它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将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因而也是人的社会心理的城镇化。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具有鲜明时代

特征和群体特征的人群。他们融入城市的进程和相应的社会心理城镇化过程与上一代农民工不同,因而,聚焦他们的城市融入问题,并且透过城市融入的心理过程和策略理解他们的处境和意愿,是解读我国城镇化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理的重要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杭州新老市民社会心态及家园认同研究”联合课题组在2012年完成问卷调查和小组访谈,最终获得有效问卷870份,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问卷为319份。

调查发现,在大城市工业园区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人口特征主要是:(1)男女性别基本

^{*} [收稿日期]2013-08-23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创新项目“我国社会心态状况研究”。

[作者简介] 杨宜音(1955—),女,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事长,研究方向为中国人群众体关系与社会认同、社会变迁与社会心态、群际关系。

平衡。即新生代农民中男性和女性都外出打工，并且都有可能在制造业中就业，成为工厂工人。(2)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这样的工厂中占六成，平均年龄23岁。(3)在工业园区工厂就业的工人中，新生代农民工占68%。(4)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接近20%；高中接近60%；大专学历者(含在读)占15%；大学本科学历者(含在读)占5.05%。(4)新生代农民工在一地生活的时间比较短。以本次调查为例，1年以下者占42.50%；1—3年者占44.00%；3—5年者占8.50%；5—8年者占4.10%；8年以上者占0.90%。总体看来，在城市工业园区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集中在高中水平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在社区的居住时间平均只有1.77年。

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压力大，可以利用的社会支持资源却较少。他们所感受到的总体生活压力感介于“一般”与“有点严重”之间。从总体水平上来看，他们感受到的生活压力高于城市居民。在我们调查的18个领域的生活压力中，由高到低排在前五位的是：医疗、住房、收入、婚姻、学历。26.8%的人收入为1001—2000元，54.8%的人收入为2001—3000元，两项合计为81.6%。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不公平感和低地位感较强。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觉得这个社会“非常不公平”者占19.81%，“比较不公平”者占37.74%，两项之和为57.55%。觉得这个社会“比较公平”者占40.57%，“非常公平”者占1.89%，两项之和为42.46%。进一步来看，在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超过四成的人认为在外出打工期间受到过较多的不公平对待。统计分析显示，外来务工人员在外打工期间最常遇到的不公平对待主要有“同工不同酬”、“工作种类不平等”、“无法得到相应的社会福利”、“工作机会不平等”等。他们在主观地位认同上更多地表现出向低认同的倾向。66.88%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中下层或下层。

面对不公平对待，不同的人有不同应对方式。在被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9.76%的人选择“求助政府机关”；37.28%的人选择“离职”；9.06%的人

选择“自己找人私下解决”；20.56%的人选择“忍气吞声”；1.74%的人选择“把怨气发泄到不相关的其他人身上”；3.14%的人选择“把怨气发泄到物品上”；12.54%的人选择“求助社区”；5.92%的人选择其他方式。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居于中等偏下水平，与市民相差一个等级。

超过六成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现在的生活不理想。在询问“什么是你想要的生活”时，新生代农民工讲得比较多的是“有自己的事业”、“有一份稳定的长期的工作”、“有自己的房子”、“收入好点”、“跟家人和睦幸福地生活”、“享受社会保障”、“有闲暇的时间和可支配的时间”、“简单、平淡”等等。这些他们想要的生活，其实就是基本的应当得到的生活内容，也是大部分城市居民已经享有的生活。

统计分析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尚未明晰：(1)近五成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并不常常会想到自己是一名“农民工”，超过三成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常常会想到自己是一名“农民工”；(2)超过五成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与大多数的“农民工”或多或少有一些区别，超过两成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与大多数的“农民工”没有区别；(3)超过六成的被调查者表示为自己成为“新杭州人”(所谓“新杭州人”并不能等同于“杭州人”，但是能够反映出城市对农民工一定程度的接纳态度)中的一分子而感到高兴；超过三成半的被调查者表示与家人相比，很高兴自己是一名“新杭州人”。从上述百分比分布可以看出，为数不少的被调查新生代农具有双重身份认同——“打工者”和“新杭州人”。

大多数新市民在“打工者”、“新杭州人”两种身份认同上并非是“非有即无”的关系，而是两者兼有之。同时还可以看出，这两种身份认同并非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换言之，高“新杭州人”身份认同者，对“打工者”身份认同也高，认同者有65%以上；而真正认同新杭州人，不认同农民工身份的人，只有18%左右。低“新杭州人”身份认同者中对“打工者”身份认同高的人并不多，只有不到15%。那么那些既不认同新杭州人身

份,也不认同农民工身份的人在二元城乡结构和流动到城市后认同什么身份,就值得探究了,这批人超过五成半。

可以推测,这超过五成半的新生代农民工,处在身份认同的过渡期或者迷茫期。他们可能知道认同“新杭州人”并不现实,因为大城市并不容易安家落户;但是,接受“农民工”身份,如果返乡,既不符合他们出生长大的环境和经历,也不符合他们的期待。如果留在工业园区或者在制造业的不同企业跳来跳去,长期漂泊不定,也不符合他们的期待。他们遇到的是双重排斥,遇到的是别无选择的选择。这种没有未来的漂泊身份,让他们很容易选择当下,不能奢望未来。

二、认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的几个理论视角

社会心理的城镇化过程,从客观上看是指个体从乡村生活状态逐渐被城市文化同化的过程。从主观上讲,是来自乡村的个体主动或被动融入城市文化的过程。人的社会心理的城市化或城镇化,应该包括两个视角,其一是融入过程的社会心理机制和特征;其二是融入的内容和程度。伴随着城镇化的飞速发展,工作和居住在城市中的农业户籍者大多处于“半城市化”状态,面临着劳动和社会保障覆盖不足等困境,享受各类社会保障的比例明显低于具有城市户籍的市民。他们流动在打工城市和家乡之间。进入青春期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是不知未来心安何处,家在何方。这种漂泊感带来的焦虑和青春期的身心躁动交织在一起,使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的生存处境有可能凝结为一个社会问题。^[1]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反映出来的制度、社会 and 个体层面的问题,需要深入进行分析其根源,才能破解。在这方面,有几个理论视角可供借鉴。

(一)跨文化心理学的涵化视角

如果我们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看作个体对新社会文化的融入,那么相关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最早研究异文化适应的社会学家帕克(Park, Robert Ezra)。他提出的“熔炉理论”(the melting pot theory)广为人知。具体包括接触(contact)、融合

(accommodation)和同化(assimilation)三个阶段。^[2]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等人在上世纪30年代的研究则强调同化过程不仅包括原有文化的改变,还包括两种文化的相互改变。^[3]心理学家的研究则以贝里(Berry, J. W)从1980年至今进行的跨文化心理学的移民研究最为系统和最有进展。

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相对于跨国/国际移民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国内移民过程。其心理过程和特征可以借用贝里厘清的5个主要概念来进行探讨。这5个概念是:(1)“涵化”(acculturation,也译为“文化适应”)。最初,这一概念被看做一个单一的维度,即由从拒绝到接受的两极构成,描述移民从原有文化(original culture)向客居文化(host culture)的过渡和转化。经过多年的研究,跨文化心理学家发现,涵化不但意味着移民与客居地居民的各方面相似性增加,例如,当地语言的使用、朋友不再限于移民圈、接受当地的风俗习惯等,而且还应该包含文化间的互动甚至创新。^[4](2)“复数社会”(plural societies),一般是所谓支配性(dominant)或非支配性(non-dominant)的社会组成,它们在权力关系上往往是不对等的。特别是处于强势与弱势群际关系当中的身份认同,实际上反映了主客文化的权力关系。(3)“心理同化”(psychological acculturation),包括涵化过程中的涵化压力(cultural stress)、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等。(4)“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即主客文化之间在相似性方面的差距,以及个体在期间的位置选择。有些人选择努力接近新的文化,有些人则选择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5)“适应”(adaption)。这是个体或群体对外在文化环境要求的相对稳定的改变和顺应,可以区分为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5]

不同的文化融入策略和选择,被概括为涵化动机与态度的双维度模型。在此基础上贝里区分了4种身份。其一,原有的社会身份认同;其二,新的社会身份认同;其三,双社会身份认同(bicultural identity);其四,复杂的混合身份认同(complex hybrid identity)(参见表1)。^[5]

表1 涵化动机与态度的双维度模型

		保持原有文化身份的动机与态度	
		高/积极	低/消极
获得新文化身份的动机与态度	高/积极	整合(integration) 双文化认同 双文化身份	趋同(assimilation) 客居文化认同 新文化身份
	低/消极	分离(separation) 原有文化认同 原文化身份	边缘(marginalization) 混合身份认同 不确定身份

在这一框架基础上,贝里将客居文化对移民的态度也纳入分析框架中。他分析了移民的4种应对策略:(1)多元文化取向(multiculturalism), (2)熔炉取向(melting pot), (3)种族隔离取向(segregation)和(4)排斥取向(exclusion)。^[5]

这一框架被很多相关研究者所使用,在诸多研究领域中许多发现,但也有人质疑理论框架的分类逻辑问题。^[6]事实上,这一框架着眼于动机与后果之间的原型式的心理关系,并没有将复数社会、文化距离这两个概念表现出来,恐怕是更为严重的疏漏。这一疏漏的结果是,忽略了文化权力关系这一社会结构性特征带来的影响。

当我们使用这一视角分析我国城镇化历史巨变中的农民工身份问题,就很容易看到这一疏漏。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具有明显标志的身份概念。这一身份鲜明地打上了我国自上世纪50年代起实行的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本世纪初加速形成的城市化进程等半个多世纪发生在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烙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与一般移民(immigrant)所遇到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一般意义上的移民和新生代农民工都是社会流动的产物。特别是,他们都是在地理空间、生活方式、语言文化存在差异的社会之间转换。不同之处在于,新生代农民工与老家还保持着重要的联系,虽然这种联系并不都是自愿的、可选择的,但至少每年春节,他们大多会选择返回,与亲人团聚。他们在老家与亲朋好友分享外出的经历,用外出务工得到的收入盖房、结婚、赡养留守的老人和抚养留守的孩子。在农村的家,仍然是不能不回的地方,社会保

障、家庭责任、牵挂以及一些梦想仍然在那里。同时,长期生活在城市的某一个地方,他们了解了都市,找到了生存的机会,学会了专门的技能,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正在逐渐向一个“城里人”靠拢。他们在两个被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等各类因素割裂的地方流动、徘徊、往复,不知道最终会落在哪里,不知道最终能够落在哪里。作为农村人,他们有户口,有土地,有房屋,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从未务过农,土地对劳动的排斥已经让他们无法依靠土地谋生和发展。很多人都是在“不外出没有活路”的情况下远走他乡的。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甚至就是在城市中出生长大的,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已经不限于出于谋生的动机,他们还希望获得自己的新身份,和城里人一样生活在城市里。他们所具有的身份,并不是一个社会所正式或非正式接纳的移民的身份,而是在一个制度的边缘和空隙中谋得了一种带有模糊的、暧昧的、两栖的、可进可退的身份。他们面对的,不仅是跨文化心理学关注的文化融合(acculturation)、文化社会适应(adaptation)的问题,^[7]还有制度性歧视和排斥的问题,并且是来自城市和农村双重的制度性歧视和双重的社会排斥。

因此,我国跨城乡的农民工流动,其特征并不是典型的文化间的转换和适应,也不是文化濡化的过程(enculturation,是有别于涵化的一个概念,发生在同一文化内部的纵向的传播过程),而是从低身份(农民)向高身份(城市居民)的移动和过渡过程中,个体或整个农民工这一社会类别在身份协商中权力资源过少而导致的无法获得新身份或获得高身份过程受阻的问题。因此,从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层面赋权于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可能才是认同改变的关键所在。在解读这一新生代农民工现象时,将文化距离(cultur-

al distance)概念转换为权力距离概念应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它凸显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人两类人群之间的权力关系。

(二)群际关系与身份认同视角

身份认同是与群际关系(intergroup relation)相关联的概念。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放在群际关系的视角之下,可以看到类别关系带来的影响。群际关系来自两个以上的社会类别之间形成的心理关系。当个体通过身份认同,找到了自己的同类,就会形成一个区分的边界。边界内部形成“我们感”或者“内群体”(ingroup)感受,而边界之外的就是“他们”或者“外群体”(outgroup)。内群体和外群体之间就形成了群际关系。^[8]

这一以“区分”为核心的理论视角看似简单,由“社会类别”带来的身份认同也是社会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社会事实和心理事实。然而,异文化之间的接触并非发生在真空中,而是发生在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及社会优势(social dominance)较为凸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于弱势文化群体而言,与强势文化群体接触会带来一定的心理代价(psychological cost)。^[9]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不仅相互区别,而且在社会地位结构中处于支配-被支配的权力关系中。社会支配理论(social dominant theory)正是在这方面将“区分”概念赋予了权力关系的意味。^[10]

外来务工人员大量出现在城市中,让“城里人”与“农民工”形成两个相互必须正视的群体。由制度上建构出来的这两个社会类别,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固化,和另外几十年的破解,面对和参与着这样一个变动的过程,农民工群体和城市居民群体都身不由己地面临着群际关系及其调整。他们彼此知道对方,能有一定的印象和判断,也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和工作场所中有了一定程度的接触。可以说,城市化进程,使得农民工和市民在城市中相遇,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嵌入。农民工进入城市生活,市民了解农民工对城市建设的贡献,在很多方面依赖他们提供的服务,也感受到就业的压力、环境的拥挤、资源的重新分配、原有城市生活秩序被打乱等等改变。从农民工的角度看,他们带着新的身份,也感受到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的

被隔离和区别的“另类”生活,他们会本能地思考这种处境的缘由何在,为什么自己一出生就变成了二等公民?对于社会身份和地位,他们有自己的信念和原因归属倾向,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行动策略和对未来的预期。这样的社会接触,不是简单的内外群体的接触,而是两个制度上和社会心理上权力地位不同的群体类别的接触。

泰弗尔(Henri Tajfel)是最早提出身份认同概念并且开拓这一研究领域的社会心理学家。他认为,人们对他/她属于某些社会群体的知识,同时对他/她的群体成员身份(group membership)赋予某些情感和价值上的重要性即是身份认同。^[11]索茨(P., Thoits)和缠舍普(L., Virshup)则强调这一身份的获得具有社会建构性。他们将社会身份认同界定为“被个体接受,用来描述自己或自己所属群体的,被社会建构的和被社会赋予意义的类别”。^[12]

农民工这一身份并非持有者自愿选择的身份,而是在城镇化过程中被二元结构的社会制度以及城市人赋予的。因而,尽管在城市生活中农民工和城市人在许多场合下分属两类人,也有很多农民工在这个分类系统中自认为是农民工,但是这种类别化存在很强的剥夺性,是一种剥夺性身份和剥夺性群己和群际关系。这种剥夺性,体现在调查中,有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并不认同自己是农民工,或认为自己既是城市人也是农民工,或者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民工。^[13]在这样的身份中,不但包括一般理论意义上的通过显著性特征来进行的自我归类,还包含着自身的感受(共同命运感、被剥夺感和不平等感)和他人的评价(刻板印象、污名、排斥),也包含着行为卷入(疏离城市人、返乡)和社会嵌入(乡土关系网络),^[14]其身份内含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多元身份、角色丛概念的含义。

(三)社会心理的动态建构的视角

芬兰裔的社会心理学家杜尔琦(Kay Deaux)出版了专著《作为移民》(To be an immigrant),试图从社会身份建构的角度,“问所未问”,从而“见所未见”。^[15]她认为,移民的身份认同,不仅是一个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动力的和象征的过程(a dynamic and a sym-

bolic process)。因此,要把个人放入情境中,特别是放入情境中的具体情景中(person in situation in context),^[14]从而看到个人在社会文化情境下的处理和应对具体事物和事件的内部过程。特别是其中个体所进行的身份协商过程(identity negotiation),是个体确定自己与他人、自己与本群体、自己与他群体、本群体与他群体的关系过程。

杜尔琦特别将社会心理学对于移民身份认同问题的分析水平置于佩蒂格鲁(T. F. Pettigrew)所区分的宏观、中观、微观中的中观水平上。她认为宏观水平(macro level)的诸因素从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制度和政策、组织和社会表征方面为移民的身份认同提供体制、组织和意识形态、社会共识方面的背景。微观水平(micro level)则是从个体的态度、动机、价值观、信念、人格角度显示出具体的内部过程和个体差异。而中观水平(meso level)恰恰关注的是社会互动的环节,能够揭示出个体与情境之间相连接的中间过程。正是在这里,移民持续的直接接触(continuous first-hand contact)异文化的体验被展示出来。帕迪利亚(A. M. Padilla)与佩雷斯(M. Perez)将杜尔琦的中观水平和贝里的“心理涵化”概念操作化为四个主要因素:社会认知、文化竞争、社会认同和社会污名。^[16]

帕迪利亚以及基弗(S. Keefe)将文化知觉(cultural awareness)用定量的方法进行了测量,具体包括客居文化语言使用的优先性、对客居文化的文学艺术欣赏和理解、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知晓和关注、社会行为规范的接受和遵守等。同时,还用族群忠诚度(ethnic loyalty)概念反映移民对自身先赋性族群特性(self-ascribed ethnicity)的恪守程度。他们从追踪数据中发现,在墨西哥第一代到第四代移民中,文化知觉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其中,从第二代开始出现了急剧的上升。但是,这些移民却保持着很强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说,他们可以适应和接受新的文化,但是他们依然认为自己是墨西哥人。^{[17]-[18]}

这里就反映出文化竞争和身份协商的内容来。移民需要重建自己的认知结构、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这是一个人与两个身份谈判,其中不同

的个体会经历不同的情绪感受,例如,失望、愤怒、压抑、生气、冲击感等,最终接受或者疏离新的文化。因此,新近的一些研究关注到移民的自尊水平、情绪体验、文化疏离感等方面,帕迪利亚与佩雷斯提出了更加具有社会心理过程特征的新视角,即包含上述4个成分的心理同化理论。^[16]

文化心理学家康莹仪(Hong Ying-yi)等人对双文化个体(bicultural individual)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文化动态建构模型(The Dynamic Constructivist Model, DCM)。在这一模型中,首先,文化被定义为群体成员共享的知识网络(networks of shared knowledge)。这里的知识是指文化群体内共享的信仰、价值观和俗民基本观念(lay theory)。作为知识传统的文化具有如下特点:为成员所共享;外化于器物、符号、风俗甚至社会制度中;是群内成员交流的基础;具有代际相传的特点;在新的社会秩序中不断变化。其次,不同文化群体分享不同的知识体系。第三,启动不同的知识网络会得到不同的行为反应。第四,对于同一文化成员来说,虽然共享相同的知识体系,但与其他知识特性一样,共享知识也具有可用性(availability)、接近性(accessibility)和适用性(applicability)等特点,知识的提取和启动需要特定情境的唤起(evoke),因而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符号(icons)的出现会激活相应的行为反应。第五,个体不同的特质作为边界条件(boundary conditions)和调节变量(moderator variables)调节文化作用于个体行为的过程。^[19]康莹仪等人提出的动态社会建构论,让我们理解农民工城市融入时的身份认同,需要从对文化知识的共享角度来评价,因为文化身份是具有社会性的,必须与另一文化成员共享,并且这种共享将建构出一种新的现实。此外,有可能在建构过程中出现多元文化个体的心理结构,使之能够适应多元文化的环境。

此外,这一理论让我们对移民研究中有关双文化身份认同整合(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 BII)的研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一理论挑战了贝里等人的移民文化适应的理论,提出双文化身份本身的积极意义,并且对移民个体双文化适应的心理机制进行了肯定。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BII理论本身的预设。个体整合双文化心理

过程的机制,即被称为文化开关框架(cultural frame switching, CFS)本身具有社会环境赋予的意义,因此对于社会文化适应来说,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20]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当户籍制度尚未进行彻底改革时,他们在制度夹缝中的求生状态与国际移民存在的不同在于文化差异。这里的文化差异主要是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有语言、习俗、生活方式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身份中权力意义的差异。农民工的低地位,使移民的含义主要定位于地位上的移动,因为两种文化之间在社会表征上可能是上下对立的。当然,在个体层面,积极的双文化体验,对于个体的双重身份整合具有正面的影响。动态建构的理论视角让我们看到地位移动的内部过程的重要性和个体对身份的建构性。

(四)社会表征理论视角

社会表征理论(Social Representation Theory)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塞尔日·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在反思美国主流个体主义心理学基础上提出的。该理论自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后,影响和带动众多社会心理学研究者使用社会表征理论范式进行各个领域研究。

社会表征体系的形成和变迁是社会表征理论讨论的主要内容。社会表征的核心是对陌生的知识熟悉化(familiarization of unfamiliar knowledge),这种转变过程不是人们主动掌控的,而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并且可分成两种过程:固化(anchoring, 又译锚定)和客体化(objectification)。固化是指利用已有的知识吸收和同化不熟悉的知识,通常有两种方式:命名(naming)和分类(classification),也就是说用类别化和命名的方式使不熟悉的知识与已有知识建立联系,从而更好地理解 and 吸收;客体化是指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也就是说对某种抽象知识的感受可以用产生类似感受的具体化知识或概念类比出来。^[21]

莫斯科维奇认为,社会表征有三种形态:支配性(hegemonic)表征,社会主流的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会对普通人形成示范性的具有霸权或支配性的社会表征;解构性(emanipated)表征,在被社会主流的思想或意识形态主宰的社会表征中,会

出现亚群体对主宰性共识体系的解构;激化性(polemic)表征,在社会变迁中对立的群体各自构造的表征体系会产生冲突。概而言之,社会表征理论为探讨社会或群体共识的形成提供了一种社会心理取向的解释。^[22]

社会表征理论因其对“社会性”的强调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被广泛应用于不同领域,例如:法国共产主义者、天主教徒和自由主义者对精神分析的不同社会表征研究;法国社会对健康与疾病的社会表征研究;白人与黑人对艾滋病的社会表征比较;人权的社會表征研究;欧洲一体化的社会表征研究;中国文化背景下生活质量的社会表征研究等。^[23]

社会表征研究范式在两个方面可以运用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研究:(1)更倾向于在社会文化历史的背景中寻找人们心理机制产生的基础。社会表征理论借鉴科学史学“基耦”的概念来讨论人们的社会表征中深层的核心机制。这一概念核心机制是指人们对现实问题的社会思维与社会行为根植于其文化中,讨论的是社会表征显性内容与深层结构、社会形态和社会共识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例如,农民工群体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其他社会群体如何看待农民工身份?这两种看法在人们的脑海中如何表征?“穷、脏、文化水平低、不适应城市生活”等社会污名与城乡分割的制度之间,与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布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2)强调沟通及社会与个人的互构性。社会表征理论强调沟通和符号互动系统建构共同框架影响态度改变和行为干预中的作用。社会表征的形成可以分为 6 个过程:遭遇不熟悉事件;对不熟悉事件进行应对;锚定和具体化方式形成表征;对新事物产生社会表征后以符号方式通过大众媒介和人际沟通形成;通过不断的沟通使用新概念,将陌生的现象转化为共同知识;共同知识表征带来群体的社会认同。在这里,社会表征理论更强调个体与社会的互动,社会表征的过程即是个体获得内化知识的过程,也是个体与他人沟通的过程,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也是社会事实被不断建构的过程。这种动态的社会与个人互相建构的机制与社会心态的社会与个体双向建构的特性具有一致性,因而其问题意识、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都可以

借鉴在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中。因为身份本身就是一种表征,它包含了社会关系、权力距离和群际关系、个人身份整合经验的建构,是社会对心理的嵌入的结果。一个人认同自己是城市人还是农民工,抑或是两者都认同或都不认同,表面上看是一个人的选择和认知过程,实际上反映了社会的支配性和个人的选择性之间的博弈,反映了个人的选择性与内外群体的关联性。

(五)全球化的视角

全球化的视角也是社会变迁的视角。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不仅影响到移民身份中主客文化之间的协商,而且以更大的冲击力和全球性身份认同的力量,包容了主客文化之间的差异。这里,强势文化的特征更为明显,但同时,在地化的力量和保持文化特征、接受文化多样性的动机和情感也更为强烈。在这样的情况下,移民的身份认同就变得更为多样,不限于主客两种文化的处理,而且包括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化的视角还揭示出大众传媒时代对城乡文化边界的冲击,代际的差别在很多情况下超过了城乡之间的差别。^[24]特别是生活在城市中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其他青年群体也有很多时尚文化的共同之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的预期高,出现对原生文化的疏离感和受到排斥后的客居文化疏离感会同时存在。^[25]

这一理论视角提示我们注意,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是农民工,更是青年新生代,他们的青年身份认同可能会强化城乡二元结构的身份困境,也可

能因人力资本(学历、城市经历、工厂经验等)超过上一代农民工而出现化解困境的契机。他们选择身份的动机将会更强,冲破城乡户籍等制度藩篱的要求也更为迫切。

三、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过渡性特点

从上述理论视角的分析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是城乡关系的现实表征。当我们从多个视角来进行观照时,可以了解到社会结构性问题以及人与制度的互动过程。其中,文化同化与全球化的视角注重了个体在文化间接触、影响下的反映,特别是在身份问题上的应对策略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依然具有过渡性。一小部分人可能已经完全认同城市人身份或工人身份;还有一小部分人仍然认为自己就是农民,不会被城市接纳;更多的人认为自己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农民,又是城市人。这种双重认同,并非双文化整合,而更具有过渡性。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自己处在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民这种双重排斥的身份中间,处在身份的空白期。双重身份具有过渡性,也可能成为身份认同的策略,并且可能保持着某种弹性和回旋的心理空间。需要注意的是,这可能不是源自双重接纳,反而是双重排斥,因而这种状态就具有负面的影响,是一种身份困惑(identity confusion)。不能整合而表现出的过渡性,增大了身份焦虑,也提升了获得身份选择自由的迫切性。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处在这一类当中(参见表 2)。

表 2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模型

		原有农民身份的动机与态度	
		高/积极	低/消极
获得城市人身份的动机	高/积极	双社会认同(接纳/排斥) 选择身份的动机 身份过渡性	城市人认同
	低/消极	农村人认同	身份认同困境 不确定身份(身份空白) 身份过渡性

群际关系的视角让我们将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置于城乡关系之中,从而理解身份的建构不是单方面的选择,而是内外群体的共识;不是个人意愿,而是社会结构性分类导致的上下位差和地位关系。半城半乡的处境,是有城不能入,有乡不愿回。城市的准入门槛很高,而回乡意味着贫穷和没有出路。社会表征的理论视角,将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或过渡性重新嵌入社会环境中,将权力关系的意义彰显出来。因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困境也是他们与城市人的群际关系困境。如果要实现城镇的心理融入(心理城镇化过程),就必须解决农民工、城市人这样的社会类别的制度性、地位性划分。只有这样,才可能逐步完成:(1)身份制度的融入(例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2)经济活动的融入(例如就业、消费、金融等),(3)社会生活方式的融入(例如通婚和亲属关系、社会交往、生活习俗、社会参与等),(4)语言和公共媒体的融入(例如语言和公共媒体使用),(5)社会心理融入(例如获得平等感、和谐的新老市民关系、社会合作的取向、恪守契约信用等)。

社会建构论则特别让我们注意到,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上是一群具有与现实制度环境博弈意愿的人,尽管可能拥有的各类资源都不足,但是他们有自己对身份困境的意义建构和解构的动机,有进行抗争和博弈的意愿。他们在身份认同上的徘徊正是身份不满的表现。

1914年,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就开始关注移民问题,至今这一领域已经有了百年的积累。移民研究凸显了社会文化身份这一议题,透视出所有关系、边界与过程。但是,这一概念,正如阿什莫等人所言,必须放回原本发生的社会文化情境中。^[14]而中国农民工身份问题,也必须放回中国60多年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放入权力关系中,放入农民面对身份区分和弱势地位的反抗应对中。它应该只是一个窗口,一个洞悉我们的社会是否为好社会(good society)的窗口。

[参 考 文 献]

- [1]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 社会学研究, 2001, (3).
- [2] Persons, S. Ethnic studies at Chicago: 1905-45 [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7.
- [3] Redfield, R. Linton, R. Herskovits, M. J. Memorandum for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1936, (38).
- [4] 杨宜音. 文化认同的独立性和动力性: 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的演进与创新为例[C]. 张存武、汤熙勇主编. 海外华族研究论集(第三卷)文化、教育、与认同. 台北: 华侨协会总会出版, 2002.
- [5] Berry, J. W.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J].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1997, (1).
- [6] Rudmin, F. W. Critical History of the Acculturation Psychology of Assimilation, Separation, Integr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J]. 2003, (1).
- [7] Berry, J. W., Sabatier, C. Acculturation, discrimination, and adaptation among second generation immigrant youth in Montreal and Par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10, (3).
- [8] Turner, J., C. Hogg, M. A. Oakes, P. J., Reicher, S. D. Wetherell, M. S. Rediscovering the social group: the social-categorization theory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 [9] 赵志裕, 康莹仪. 文化社会心理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 [10] Sidanius, J. The psychology of group conflict and the dynamics of social oppression: A social dominance perspective[C]. In S. Iyengar & W. McGuire (Eds.), Exploration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11] Tajfel, H. (Ed.).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M].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8.
- [12] Thoits, P., & Virshup, L. Me's and we's: Forms and functions of social identities[C]. In R. D. Ashmore & L. Jussim (Eds.), Self and identity: Fundamental issu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3] 杨宜音, 张曙光. 成为我们: 杭州新老市民社会心态及家园认同感研究[R]. 杭州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待发表), 2013.
- [14] Ashmore, R. D., Deaux K. & McLaughlin-Volpe T. An Organizing Framework for Col-

- lective Identity; Articul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Multidimensionality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4, (1).
- [15] Deaux, K. To be an immigrant [M]. New York: Russell Sage, 2006.
- [16] Padilla, A. M. & Perez, M. Acculturation,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cognition: A new perspective [J].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2003, (1).
- [17] Padilla, A. M. The role of cultural awareness and ethnic loyalty in acculturation [C]. In A. M. Padilla (Ed.), *Acculturation: Theory, models and some new findings*. Boulder, CO: Westview, 1980.
- [18] Keefe, S., & Padilla, A. M. *Chicano ethnicity* [M].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7.
- [19] Hong, Y., Morris, M., Chiu, C., & Benet-Martínez, V. Multicultural minds: A 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culture and cognition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55).
- [20] Cheng Chi-Ying, Lee Fiona & Benet-Martínez V. Assimilation and contrast effects in cultural frame switching: 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 and valence of cultural cues [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06, (37).
- [21] Moscovici, S. & G. Vignaux. The Concept of Themata [C]. In S. Moscovici, *Social Representations: Explorations in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 [22] Moscovici, S. Notes towards a description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88, (3).
- [23] 管健. 社会表征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对莫斯科维奇《社会表征: 社会心理学的探索的解读》[J]. *社会学研究*, 2009, (4).
- [24] Arnett, J. J. The Psychology of Globalization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2, (10).
- [25] Christine, J. Y. Age, acculturation, cultural adjustment, and cultural health symptoms of Chinese, Korean, and Japanese [J]. *Immigrant youth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2003, (1).

Transitional Identity of the New-generation of Off-farm Workers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YANG Yi-yi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large-scale flow of rural force into the cities has a history of over thirty years. As time marches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off-farm workers' identity has become obvious. The new-generation of off-farm workers at the age about 26 numbers about 100,000,000 in China and they often change jobs in different places with their identity showing some transitional features as follows: They are neither urban citizens nor farmers but in-between or marginalized by their transitional rol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ir identity from fiv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that is, the acculturation perspective of inter-cultural psychology, the inter-group relations in the theory of social identity, the dynamic construc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the theory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heory of globalization. It concludes that the identity dilemma of these off-farm workers is more related to the institutional classification than their individual choice. The hierarchal structure of such classification plus their desire for a change of identity has produced their identity crisis which mirrors the power struggles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 words: new-generation of off-farm workers; transitional identity; social classification

[责任编辑: 刘胜兰]